义理与词章之间:朱子的文章论

张 健
(香港中文大学 中文系, 香港)

摘 要: 朱熹的文章论在内外关系的架构中,以道德与文章关系为基础,将文章纳入其理学体系。文章是内在道德的外在呈现,道德修养工夫使作者有诸己,内在道德形之文章成为义理,义理有其自身的结构,发为文章成为其结构形式。文章有义理是实,有合理的结构是有条理。个人的精神境界呈现于文章的整体美感特征为气象。最高的文章境界与最高的精神境界一致,圣人两种境界合一。

关键词: 朱熹;文章;义理;词章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3-0097-14

朱子文学观现代学者论之已多,大体上是围绕着文道关系展开。现代文学理论主张文学的独立性,论者往往把文道问题放到现代文学理论的视野下透视,以为古文家之观点重文,符合文学自主观念;理学家之理论重道,背离文学独立性观念。郭绍虞先生将古文家与道学家的文论分为“贯道”与“载道”,以为前者承认文学的特性而后者则否,①就是以现代文学理论观念照察的结果。站在现代文学观念的立场上,理学家的文论自然受到批评与否定。郭绍虞先生认为,在理学家文论中,朱熹是集大成者,虽在南宋道学家中可推为能文之士,但其文学观却绝不带古文家的意味,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②有学者认为,二程代表极端的否定文学性的立场,而朱熹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二程的偏颇,承认了文学的特征,于是将朱子的文论立场分为道学立场与文学立场两方面论述,③而认为朱熹的这两方面立场不能统一,故其“文论中也有矛盾”,④“时常出现”“龃龉不合”,“以至支离破碎的现象”。⑤本文不拟全面讨论朱熹的文学观,⑥而讨论其文章论;亦不采取道学与文学两分的立场审查归纳朱子的文章论,尤其不采用现代文学理论的框架分为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等目,而尝试将其文章论放回到朱熹本人乃至宋代理学脉络中,讨论其特征,以求呈现其在朱子理学脉络中的本来面貌。

收稿日期:2018-11-12
作者简介:张健,男,安徽阜阳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0—104 页。《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同上书,第 170—191 页。

② 郭绍虞:《朱子的文学批评》,《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 413 页。

③ 钱锺书先生《论复古》一文认为,“文以载道”不属于文学批评,只限于道学的范围,而道学家也有文学批评的论述。见《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三联书店 2012 年版,第 268 页。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五册有“朱子之文学”一章,台北:三民书局 1971 年版,第 151—190 页。何寄澎《朱子的文论》将朱子文论分为“道学化的基本观念”与“文学化的衍生观念”,以后者与古文家相通。钟彩钧主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1993 年版,第 1215—1232 页。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亦从其理学中分离出文学,包括文学创作与理论。

④ 张健:《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26 页。

⑤ 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68 页。

⑥ 关于道学家与朱熹的文学观念及诗论,参见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第六、七、八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83—404 页。

一、从文道到文德：文章在理学体系中的位置

朱子文章论建立在对学术传统的反省与批判之基础上,在他看来,文章脱离了儒学,缺少精神内核,成为外在的词章之学;他力图将文章放回到儒学的脉络中,重建文章的内在核心价值。

朱子对文章传统的反省与批判直接受程颐影响。程颐认为:“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①与之相应,学人也分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为儒学也”。② 程颐认为,文章、训诂本应从属儒学,但他也承认学问歧而为三久已成为事实,不过他认为此虽事实,却不合理。在他看来,训诂与文章之学脱离儒学,成为与道无关的知识与技艺,就我们论述的文章而言,这种脱离了儒学之道的文章,程颐又称作“词章”“词章之文”。③ 程颐批评“今之学者”“溺于文章”,④就是指这种“词章之文”。朱子说:“自秦汉以来,……儒者以词章记诵为功。”⑤也是指此一传统。按照朱子的说法,秦汉以后道德与文章分离了。朱子从道与文离合的角度将文章历史分为“有本之文”“有实之文”与“无实之文”三类。有本与有实的划分以内容是否合其所谓道为标准,内容合道者为有本,有自己之道而未必合朱子所谓道者为有实,而无关乎道者为无实。朱子持之论文章历史,以经典为有本之文,战国到西汉文为有实之文,东汉至隋唐为无实之文。⑥ 上承韩愈传统的欧苏等古文家的文章也仍然属于无实之文。朱子之文章论的目的就是要为文章确立道德基础,重建“有本之文”。在他看来,这是理学文章论与文士词章学的根本区别。

按照程颐的说法,“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⑦朱子重建“有本之文”,正沿此一路径。程朱将文章放回先秦儒学的脉络中,其经典依据出自《论语》。《论语·公冶长》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朱子注:“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⑧朱子把文章解释成内在之德的外在显现,包括身体、语言、仪表、神情等一切外在的表现,其《读唐志》说:“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⑨正可与前注互相印证,这是一个涵盖极其广泛的外在表现形式的概念。其中,“文辞”“言语”“简册” 即一切语言文字作品,只是范围广泛的文章的一个方面,即便是此一方面含义,其范围也远大于后世所谓文章的“词章之文”。朱子明确把德与文章诠释为内外的关系,德为内,文章为外,文章为内在之德的外在表现。朱子这样诠释,亦有其经典依据,即《论语·宪问》中孔子谓“有德者必有言”,朱子注:“有德者,和顺积中,英华发外。”⑩此将“有德者必有言”放到内外关系的架构中,用《礼记·乐记》之“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来诠释德与言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把“夫子之文章”也放到内外关系的架构中理解,将“有德者必有言”的“言”换成“文章”,就变成有德者必有文章。这是朱子文章论的最基本命题。

当文章与德建立了必然联系,朱子便把经放

---

① 《河南程氏遗书》(下简称《遗书》)卷十八,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87 页。
② 《遗书》卷六,《二程集》,第 94 页。此条原编为标二先生语,然与上条若合符节,当为程颐语。
③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239 页。
④ 《遗书》卷十八:“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二程集》,第 187 页。
⑤ 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下文简称《晦庵文集》)卷十三,《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 册,第 632 页。
⑥ 参见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第 320—326 页。
⑦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187 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79 页。
⑨ 《晦庵文集》卷七十,《朱子全书》第 23 册,第 3374 页。
⑩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149 页。

到这种关系当中理解,于是经就成了有德者之言。其《读唐志》说:“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 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①道德与文章关系是内外关系,这是基本原理。“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②,正是此一原理之体现。朱子的这种诠释方式乃上承程颐而来。程颐说:“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③又云:

>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 “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④

程颐用“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来解释“有德者必有言”,显然是把两个命题关联起来,把德言关系放到内外关系的架构中讨论。不仅如此,程颐又把《六经》作为圣人之言放到了德言关系的架构中,以诠释《六经》的写作问题。朱子正是如此。

在程朱理学的系统中,“所谓德者得也,须是得于已,然后谓之德也。”⑤德原自性,性是理,理即是道,这样德就源头上说也就是道,因而德与言、文的关系,也就是道与言、文的关系,传统的文道关系命题就与德言关系命题衔接起来,被置于内外关系的架构当中,这种关联乃是对传统文道论述的置换与重建,实质上是以文德关系重建了文道关系。在这种新的文道论述中,重心转向了个人道德与文章的关系。于是作者的道德修养问题凸显了出来。

程朱理学以《大学》为其观念架构的基础,但在《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系统中,并没有文章的位置。当程朱把文道关系置入德言关系架构中,文章就与《大学》的观念架构建立了关联。依朱子之说,《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明明德之事”⑥,能“明明德”,则“有德者必有言”,有德者必有文,因而文章的根本在修德。朱子的这种观念也直接来自程颐:“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⑦“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则不期于文而自文矣。”⑧按照这一逻辑,道德工夫就是文章工夫,无须独立于道德工夫之外的文章工夫。

论文而基于内外关系的观念,将“有德者必有言”放入内外关系观念的架构中,以此建立道德与文章的关系,这并非朱子的独见,而是理学家的共识。事实上这些观念不止是理学家的共识,也是理学家所批评的文章家的观念。如前所论,内外关系的观念有其经典的源头,内在的东西一定会表现于外,内外具有一致性,这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一个基本观念,也是中国文论的基本观念。内外一致性观念是刘勰《文心雕龙》文论系统的核心观念之一。⑨ 韩愈把孔子“有德者必有言”放在内外关系的架构中,开启了内在道德与外在文章之间关系的论述。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父子、黄庭坚等论文皆沿此一观念展开。⑩ 理学家论文亦是如此。但是,理学家尤其是朱子建立了一套理学体系,当德言关系被置入理学体系当中之后,理学家尤其是朱子的文章论便有了自己的理学架构及脉络,即用《大学》的架构讲“修身”“明明德”,以德言关系论文章。在朱子看来,韩愈等文章家并没有道德修养的理论,更没有道

① 《晦庵文集》卷七十,《朱子全书》第 23 册,第 3374 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3319 页。
③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239 页。
④ 《遗书》卷二十五,《二程集》,第 320 页。
⑤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206 页。
⑥ 《大学章句》:“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四书章句集注》,第 4 页。
⑦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233 页。
⑧ 《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第 1195 页。
⑨ 参见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第 68—75 页。
⑩ 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第 36—68 页。

德修养实践,而他们所讲论所实践的只是文章的修养工夫,因而文章家的文章没有道德基础,只有外,没有内,不是“有德之言”,而只是“词章之文”,两者有根本性区别。

二、内与外:流出、说出与做出

理学家是在内外关系架构中论文章的,强调外在的文章是内在道德的外在呈现,而从内到外的呈现过程及特征在其文章论中意义重大。他们极重从自内而外的流出、说出与外在地做出的分别,认为这是经典之文与词章之文的差别所在。这种分辨放到现代文论视野中看,便触及文章的创作过程与状态问题。

程颐说:“圣人文章自深,与学为文者不同。如《系辞》之文,后人决学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为之者,或有绘画为之者,看时虽似相类,然终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①程氏提出“圣人文章”与后世“学为文者”的分辨。前者是自内而外的“发摅胸中所蕴自成文”,也就是上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圣人文章是有德充于内心,自发地说出写出,没有自觉的作文意识。从文章创作的角度看,圣人的创作是一种自发式的创作,是“自成文”,程颐比作“化工生物”,其类似性在于两者都是自发生成。对于文章而言,其形式不是从外在获得或强加的,而是内在于“胸中所蕴”,如植物般从内在生长出来的,不是人工设计制作而成。这种“化工生物”的境界会使得文章呈现出独特的美感特征,具有“生意”,即有机生命性。“学为文者”即有意识地作文,这种创作形态不是内在充满从内向外自发地流露出来,其形式是从外在赋予的,这种境界就不能与“化工生物”相比,拟之于花,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像剪花或画花,即便外形相似,但缺乏“生意”,没有生命性。

从现代文学理论观念角度看,程颐提出了创作状态与美感特征之间的关系问题。由充于内而自然地外发之于文,跟从外在的学为文即有意识有目的作文,其差别不仅是内容上,而且是审美上的。不仅如此,在理学的脉络中,“化工生物”之境与“剪裁”“绘画”之境与人的精神境界有密切关系。《程氏遗书》卷二上:

> 孔孟之分,只是要别个圣人贤人。如孟子若为孔子事业,则尽做得。只是难似圣人。譬如剪彩以为花,花则无不似处,只是无他造化功。绥斯来,动斯和。此是不可及处。②

“绥斯来”二句见《论语·子张》,乃是子贡评论孔子的话:“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③按照理学家的理解,孔子这种治理国家的境界乃是一种化境,即所谓造化功,不用人为有意、用心费力地达成。其所以能如此者,乃是因为圣人之精神境界完全与道合一,故可以参天地之化,其形于言,施于事,都是道之体现,其功能亦与道同,如化工生物。贤人则是人为有意的境界,不能与化工相并。程颢说:“圣人,化工也。贤人,巧也。”④正是此意。在这种意义上说,圣人文章的化工境界与圣人内在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统一的。程氏所说的这两种境界后来被李贽概括成“化工”与“画工”的对待,⑤成为性灵派美学重要的思想源头。

由于程朱视文章为自内心发出的言语,则文章就自然会被作一种说话或言说。程颐说:“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说自己事,如圣人言圣人事也。造道之言则知足以知此,如贤人说圣人事也。”⑥程颢说:“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圣人事者,造道之言也。”⑦“有德者,止

---

①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240 页。
② 《二程集》,第 44 页。此卷标“二先生语”。
③ 《四书章句集注》,第 193 页。
④ 《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 127 页。
⑤ 李贽《杂说》,《焚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96 页。
⑥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196 页。
⑦ 《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 127 页。

言己分事”。① 按照这种说法,圣人“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的“有德之言”就是“有诸己”,②“说自己事”,是一种自我言说,圣人这种“说自己事”的文章即是化工生物的境界。

二程所说的文章境界在理学家的文章论中被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讨论。朱子引述林光朝(艾轩)之语将文章分为“说出”与“做出”:

> 林艾轩尝云:“班固、扬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恁地说出。”③
>
> 林艾轩云:“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④

对读林光朝的上述两段话,可知所谓“恁地说出”即“自在流出”,即自动地从内向外流出。值得注意的是,林光朝认为司马相如是“赋之圣者”,在赋的方面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此说明在林光朝看来,圣人文章的境界是“自在流出”,此与二程“说自己事”“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观念一致。林光朝是论汉代文章,西汉之司马迁、司马相如属于“说出”者,而班固、扬雄以下属于“做文字”,即人为地做出。

朱子赞同林光朝之说,“今看来是如此”。他沿着林光朝之说往前推论,认为《离骚》《卜居》等作品“想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⑤又称“庄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⑥ “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后世只就纸上做。如就纸上做,则班、扬便不如已前文字”。⑦ 不仅如此,朱子还认为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口说的时代与写作的时代,他虽然没有说写作的时代始于何时,但据其论述,可以大体推测,班固、扬雄已是写作的时代。⑧

口说与写作的区分在文学上的意义乃在于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状态,口说也就是从内心“自在流出”,写作亦即“就纸上做”乃是有设计、按照一定的规范写作,即“填”“腔子”。这两种不同的创作状态会对作品的审美特征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审美特征不同,其审美价值也有高下之别。扬雄《法言·五百》曾说“圣人矢口而成言,肆笔而成书”,⑨尽管林光朝及朱子都认为扬雄恰恰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但林、朱二氏与扬雄的论文观念实有一致处。

程朱所说的这种“流出”的文章境界其实与韩愈及苏轼父子论文相通。韩愈论作文“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就是用水流作喻,其所谓“汩汩然来矣”,“浩乎沛然”,⑩即是从内心流出之意。苏洵言其读书养心过程,“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⑪也是从内心流出之意。他论文主张“无营而文生者”,主张“自然”,⑫即与是化工生物之意。苏轼说:“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又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⑬此正与程朱一样强调非有意作文。苏轼自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

---

① 《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 21 页。
② 《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 14 页。
③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5 页。
④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0 页。
⑤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5 页。
⑥ 《朱子语类》卷一二五,第 2992 页。
⑦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297 页。
⑧ 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五册,第 166 页。
⑨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卷十一,第 267 页。
⑩ 《答李翊书》,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卷三,第 170 页。
⑪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曾枣荘、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8 页。
⑫ 《仲兄字文甫说》,《嘉祐集笺注》卷十五,第 413 页。
⑬ 《南行前集叙》,孔繁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23 页。

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①也正是以水为喻,谓其从胸中自动流出。从文章论的层次看,这些论述与程朱所论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根源其实在于程朱与韩愈、苏洵父子一样都是在先秦儒家内外关系的观念架构中论述文章,而其不同处则在于程朱的文章论背后还含有理学的意涵。理学家认为韩、苏等人没有遵循应有的道德修养程序,没有达到他们所认可的精神境界,因而否定其文章真正是“有德者之言”“从道中流出”。如果不是“从道中流出”的话,则文章就不是真正内在的流出,而是外在的做出。

三、义理与结构:天生成腔子

圣人文章如“化工生物”,不是人为造作,而是自然生出,经典又是最好的文章,那么,这就意味存在天然的文章形式,圣人的文章正好是这种天然的文章形式。朱子说:“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②“腔子”是躯壳之意。③ 文章之躯壳乃是形式。④ “天生成腔子”意味着文章具有一种固有的自然的形式。放到内外关系的脉络中看,这种“天生成腔子”正是从内心流出的,是内在德性的自身形式。这种观念放到他的理学系统自有其依据,即他相信“事事物物,莫非天理”,⑤没有不含理的存在,就文章表现的对象而言,每一事物皆有其理,则其理之呈现必然有其自身的义理结构。这种的义理结构以语言形式表达,自然生成文章的形式结构。朱子说:“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⑥正因为圣贤言语就是天理(自然之理),故由之可以观自然之理。圣人文章的理就是事物本身的理,其文章结构就是事物自身的义理结构,两者合一。当然圣人与贤人境界有差异,文章还有层次的差别。圣人文章不是有意设计出来,而是圣人之德与天理完全合一,自然发出即是天理,就如化工生物。朱子说:“圣人之言,虽是平说,自然周遍,亭亭当当,都有许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⑦圣人言语的“周遍”正体现出天理的完整结构,又说:“圣贤说出来底言语,自有语脉,安顿得各有所在。”⑧“语脉”谓言语有其内在的义理结构,体现在语言上形成其文本形式结构。圣人文章并非有意安排,但其结构安排合理,这种结构是自然生成的。朱子不止一次表露类似看法:

> 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齐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细穷究。若子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⑨

此以树木为喻,谓圣贤言语文章之各个层次(枝叶喻不同层次元素)都安排得恰当有序。因为圣人并非有意作文,故其“排得”“齐整”也非人为安排,而是出于自然,即天生成。他又说:“《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齐整!”⑩圣贤文章为什么会体现出这种整齐有序的结构呢?按照程朱的理论,其实是呈现了自然之理的秩序。按照理程颐的说法,“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⑪程颢也说:“大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

---

① 《论文》,《苏轼文集》卷六十六,第 2069 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22 页。
③ 《朱子语类》卷五十三:“腔子,乃洛中俗语。”第 1284 页。《朱子语类》卷五:“腔子是人之躯壳。”第 90 页。
④ 冯友兰《新理学》将朱子此说理解为文章之理,即“艺术作品之本然样子”。《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0—171 页。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下:“腔子即一种类型化的风格或创作模式,相近于后来批评中所常用的格调、格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75 页。
⑤ 《朱子语类》卷四十,第 1033 页。
⑥ 《朱子语类》卷十,第 162 页。
⑦ 《朱子语类》卷十九,第 435 页。
⑧ 《朱子语类》卷十一,第 194 页。
⑨ 《朱子语类》卷十,第 172 页。
⑩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第 1479 页。
⑪ 《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 161 页。

安排也。"①圣贤文章乃是呈现了自然之道的结构秩序！圣人言语文章并非有意而为,乃自然而成,但却形式完美,圣人文章是天然的,其文章形式就是"天生成腔子"。

按照朱子的论述,圣贤言语文章从整体结构到下字细节都是自然恰到好处。他说:"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底也只是这几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②圣人文章并非出于人为安排,则圣人文章的"铺排"文字乃是自然生成的,即"化工生物"。按照朱子的论述,理与语言文字也有天然的对应关系,有某种理,必然会有恰当的语言文字形式。圣人言语文章是天成,自然能够呈现出这种天然的对应关系。朱子认为,古人之为文者也庶几达到这种境地,但后来人则要费力搜索了。

文章有天然的形式,圣贤文章呈现了这种天然形式。朱子对于《大学》文本的更定正是基于以上的文章观念。《大学》文本出自《礼记》,朱子认为"旧本颇有错简",然其依据不是文献版本,而是义理结构。朱子认定,《大学》本文存在着经传两部分,即第一章是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后文是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其判断的依据是,在他看来,后面的文字都是解释第一章的,这种关系就是经传关系。既然传是解释经的,那么,传的结构次序应该符合经的论述结构。但是,流传的经籍文本次序不符合,朱子判定这是流传文本发生了错乱,于是他要在二程改定的基础上,"更考经文,别为序次"。③ 朱子重新"序次"的依据是什么呢？即文本的义理与形式结构。他说:"凡传文,杂引经传,若无统纪,然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④朱子认为,传文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与结构,他改定文本次序就是依据这种结构次序。朱子这样做,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观念前提:传文的文本结构次序与义理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文本结构应该符合义理结构;其所以如此者,乃是因为义理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是文章结构的基础,这种结构是天生成的。曾子是贤人,圣贤言语文章就是天理之呈现,必然会符合义理自身的结构。

朱子论文章,特别注重义理结构与形式结构关系。他说:"读书之法,有大本大原处,有大纲大目处。"⑤大本大原是道理,相当于论说文的总论点,大纲大目是道理的不同层次的结构,相当论说文的不同层次的分论点。文章的形式结构则为篇、章(段)、节、句、字。朱子认为,"《大学》一书,皆以修身为本",⑥这是本原;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之纲领";格物、致知等八项,是"大学之条目"。文章的义理结构呈现在文本的形式结构上,朱子特别注意其结构关系。如《大学》之第一章: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此部分朱子分为三节。第一节至"止于至善",第二节至"虑而后能得",其馀为第三节。朱子指出,第一节是"此三个大纲,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内",第二节"是说效验如此","上面是服药,下面是说药之效验",⑦第三节"结上文两节之意":"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⑧既指出其义理的逻辑联系,也表明其形式结构关系。

再看其对《孟子》的讨论。朱子说:"某因读

---

① 《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121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3301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
⑤ 《朱子语类》卷十一,第182页。
⑥ 《朱子语类》卷十四,第252页。
⑦ 《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08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

《孟子》,见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间架。”①此亦关注《孟子》的结构。朱子说:《孟子》“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②“每段自有一二句纲领,其后只是解此一二句”,正是指这种结构关系。朱子认为《孟子》文章结构并非出自有意的安排:“孟子当时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语说出来,首尾相应,脉络相贯,自是合著如此。”③“合著如此”是应该如此,理当如此,换句话说,孟子文章的结构乃是道理的自身结构,不是人为安排的,而是自然生成的。

在朱子,“天生成腔子”体现文章的固有形式,具有永恒性,在历史中也形成了文章传统,即所谓圣贤文章。这一传统乃是文章之正宗。但朱子并非主张只有一个标准的统一的固定的“腔子”。吕祖谦有《古文关键》评点古文,卷首有“论作文法”等目,标举各种文法,这样就把文法归结为若干种套式,或者“腔子”。陆九龄批评吕祖谦自己作文章也有个“文字腔子”,按照“腔子”作文,缺点是“文字气脉不长”。“气脉”与内在意理或情感的连贯性相关,内在流出的文章会呈现出这种内在连贯性,而当按照腔子作文时便会按照腔子填入其中,这样就会打断这种内在连贯性。程颐说内在流出的文章有“生意”,外在做出的文章无“生意”,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此一问题。朱子称赞陆九龄“眼高,见得破”, 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④明显认同陆氏对于吕祖谦文章的批评。

朱子一方面认为文章有“天生成腔子”,另一方面也批评一个固定的“文字腔子”,前者是自然的,随理而变化,后者则是人为的固定的。“天生成腔子”在圣贤或古人才可以达到或贴近,其传统是文章的正路,后来作者应该继承,但这对于后来作者而言其实是外在的。要学习,就会有文章工夫问题。不过按照理学家的逻辑,如果学者通过道德工夫达到了圣人的境界,那么,他之文章亦如圣人一样,乃是“化工生物”之境。

四、实而有条理:新的文章价值标准

朱子在其理学系统内论文章,强调文章有理,又强调文章有条理,“实而有条理”,集中体现出其文章标准。朱子重建先秦儒家之文章观念以与词章之文相区别。词章之文有其自身的价值标准,理学家欲重建文章的价值标准。

朱子曾从内容的角度将文章分为有本之文、有实之文与无实之文。在朱子看来,内容之是否有本、有实不仅关乎内容,也会在文章形式风格方面体现出来,形成文体上的特征。有本、有实的文章具有典实之特征。《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 一日说作文,曰:“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⑤

朱子所说的典实,其实还是以理为标准,典者,法则,是指合理性;实者,言之有物,即有理。是否有理、合理,是其所谓典实的依据。但典实在这里并非仅指内容方面有物、合理,更是指在文体上呈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是一种美感。朱子以程颐与苏轼对比,说程颐晚年著作《易传》“盛得水住”,以容器盛水为喻,谓严密没有缝隙,于文乃指其义理精密,呈现在文章上条理细密。他曾说:“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如云‘一言丧邦’,‘以直报怨’,自是细密。”⑥又谓“圣人作《易》,……有说得极密处,无缝罅,盛水不漏”⑦,又言“荀卿诸赋缜密,盛得水住”⑧,都是以容器没有缝隙盛水不漏喻文,言其“缜密”。可见典实一方面谓内

---

① 《朱子语类》卷十九,第 437 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〇五,第 2630 页。
③ 《朱子语类》卷一〇五,第 2630 页。
④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21 页。
⑤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20 页。
⑥ 《朱子语类》卷十九,第 431 页。
⑦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第 1655 页。
⑧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299 页。

容实,言之有物,另一方面指条理缜密,言之有序,有严密的逻辑结构。

按照现代的观念看,程颐的《易传》是学术著作,苏轼“善作文”是文学作品,两者性质不同。但在朱子,所有的文都应该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这是文章的共同性。朱子认为苏轼虽然“善作文”,但文章“疏漏”,即不缜密。按照朱子的论述,文章结构上的不缜密实原自其明理工夫不足,理不精,故体不密。① 苏轼文的“疏漏”乃是其理不精,故他说“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② 在朱子,结构的问题实质上是道理的问题。

典实之说在朱子不仅是说理文的标准,也适用于其他文章。《语类》卷一三九又载其说:

> 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如欧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如张承业及《宦者》等传自然好。东坡如《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亦是靠实。秦少游《龙井记》之类,全是架空说去,殊不起发人意思。③

“实而有条理”就是上节所谓“典实”。朱子说:“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而今要去做言语,划地说得不分明。”④条达,即条理清晰,明白流畅。这是朱子对于文章的最基本的要求。这里所举的文例是史传、游记。此两种体裁的文章涉及事实的叙述与景物的描写,与说理文有别。朱子所谓“实”自然包括事实与景物,但是,在朱子的理学系统中,事实、景物都与义理相关,因而他所谓“实”,还是以能体现理者为最要。⑤ 朱子将“文”与“实”对举,文乃是指表达的方式与技巧。朱子列举三篇文章,一篇为史传,两篇为游记。我们先讨论其所举两篇记。

按照朱子“实而有条理”的标准,苏轼的《灵璧张氏园亭记》最佳。苏轼记张氏园亭实亦将其园亭置入一个观念架构中:

>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⑥

此一段论仕与隐,谓两者皆有其节与义,即仕要忘其身,隐则忘其君,都要守其节义。而张氏筑园亭正体现出以上之观念:

> 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衢,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⑦

苏轼在文章中提出有关仕与隐的观念,而将张氏园亭与这种观念关联起来。这样张氏园亭就不是纯粹的游憩之所、赏玩之物,而具有了精神性意义与价值。这是整篇文章的骨干,朱子称赞其实者在此。其中穿插苏轼与张氏的交往、对园亭景物的描写,体现出叙事与描写的技巧,即所谓的文。

按照朱子的文章标准,秦观《龙井记》是所谓“架空说去”的例子。此文记龙井,先写龙井得名之由,中间写井泉,后写僧人辩才法师造塔及与本人的交往,交代作记之由。其中写井泉的文字乃是全文的主干,即朱子所谓“架空说去”者。秦观要写龙井泉水之佳,其论述基于一个观念,即“泉者,山之精气所发也”,然后说山之精气为什么发于龙井之地。先说西湖景色之奇绝,周边岸湖之山被景色“所诱”,其精气“不可以为泉”。再说浙江两岸的山被激流而下的江水所胁迫,其精气

---

① 《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今且于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则条理分明。”第 3254 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10 页。
③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20 页。
④ 《朱子语类》卷一三七,第 3275 页。
⑤ 莫砺锋认为,朱熹这里所说的“实”并不局限于“理”或“道”,而是泛指记叙、议论等方面有充实的内容。见《朱熹文学研究》,第 127 页。
⑥ 孔繁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第 369 页。
⑦ 孔繁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第 369 页。

“不暇以为泉”。再说只有龙井此地之山既不为“所诱”,也不为“所胁”,所以有泉水,而以龙井泉水为最。① 且不说整个论述的前提观念即泉为山之精气所发是否合理,说西湖景色“诱”走了沿岸之山的精气,其道理何在?又说浙江之激流胁迫了两岸之山的精气,其理又何在?按照朱子的标准,这些其实都没有合理性,只是为了说龙泉而虚设的,即“架空说去”,即所谓不实。由于秦观这些文字不合理,所以朱子说这篇文章“殊不起发人意思”。苏轼与秦观的记都有议论,都说了道理。但在朱子看来,苏轼说的理是实,而秦观说的理则空,关键在于此理是否真正的理,是否实有其理。

朱子所举“实而有条理”的史传文《张承业传》出欧阳修《新五代史》。张承业是唐僖宗时宦者,新旧《五代史》皆有传。欧阳修《新五代史》有“宦者传”一类,传主为张承业与张居翰两位宦者。欧阳修对于宦者有一个总体的否定立场,其传论云:“自古宦、女之祸深矣!”又云“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②并有大段的论述。欧阳修之传张承业,乃是因为“承业之论,伟然可爱,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善焉,无所不取。吾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恶,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也”。③ 欧阳修正是在这种观念架构中叙述两位宦者的。其写张承业,主要围绕其佐后唐庄宗之王业展开,而核心是其“伟然可爱”的言论。其一是承业为庄宗蓄积金粟,庄宗要钱蒲博、赏赐伶人,承业出其本人之宝带、币、马为赠,而拒绝出国家钱,谓“国家钱,非臣所得私也”,“惜此库钱,佐王成霸业尔”,几遭杀身之祸而不顾。其二,大臣卢质嗜酒傲忽,连庄宗亦被侮慢,庄宗深嫉之。承业为劝庄宗尊重贤才,故意用激将法,请求庄宗杀卢质,至庄宗说“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公何言之过也”,承业起贺:“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其三,庄宗将即皇帝位,承业谏曰:“大王父子与梁血战三十年,本欲雪家国之雠,而复唐之社稷。今元凶未灭,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④庄宗不听,承业大哭,不食而卒。欧阳修认为宦者“乱人之国”,却又为宦者立传,而其所写的宦者恰恰是因为“其论议可谓杰然欤!殆非宦者之言也。”⑤整个的宦者传在否定宦者的观念框架中展开,记述两位宦者的理由就是因为其“非宦者之言”。文章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展开剪裁与叙述的。这就是朱子赞扬其“实而有条理”的原因。

五、英气与和气:文章气象

在朱子看来,内容的实与外在形式的朴质,这两者的结合会呈现出一种浑厚的气象,这种气象不仅具有文学或审美的价值,更具有道德与政治的意义。他评论宋初文章说:“看仁宗时制诏之文极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气象自恁地深厚久长,固是拙,只是他所见皆实。”⑥“所见皆实”是内容方面,朴拙是形式技巧方面,这两者配合起来生成的气象是“深厚久长”。朱子认为这是宋初文章的共性:“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浑厚。”⑦他更把这种文章气象放到更大的文化背景中看,认为体现出当时“风俗浑厚”。朱子又将这种朴拙浑厚与和气联系起来:“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⑧

① 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21—1222 页。
②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403 页。
③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第 409 页。
④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第 403—405 页。
⑤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第 406 页。
⑥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17 页。
⑦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7 页。
⑧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7 页。

在朱子的论述中,浑成与和气有密切的关系。他说:“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虽是有许多,却打成一片。清浊高下,长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应,浑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气。”①各种乐器的合奏配合得和谐有秩序,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即所谓“浑成一片”。而这种“浑成”与“和气”相通。和气在理学的系统中具有道德的意义,体现出仁的精神。朱子说:“只天地生这物时,便有个仁”,“仁属春,属木。且看春间天地发生,蔼然和气,……非仁爱何以如此?缘他本原处有个仁爱温和之理如此。”②浑厚与和相关,和与仁相连,当文章打破了朴拙而趋巧,趋华丽,则就会失了和气,也就失去了仁的精神基础。

浑厚与和气在理学的系统中也与人格境界相关。《程氏遗书》卷十八:

> 问:“横渠之书有迫切处否?”曰:“子厚谨严,才谨严,便有迫切气象,无宽舒之气。孟子却宽舒,只是中间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之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问:“气象于甚处见?”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水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③

程颐这里论及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迫切”与“宽舒”之气。此在程颐是所谓气象,而气象不止是审美问题,更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征。④ 宽舒、和缓是和气,体现了仁的精神。韩愈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即是。在程颐,人之语言的缓急乃取决于气,而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变化气质,从而改变语言的节奏。《程氏遗书》卷十八:

> 人语言紧急,莫是气不充否?曰:“此亦当习。习到言语自然缓时,便是气质变也。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⑤

变化气质需要修养工夫,语言节奏缓急的变化正体现了修养工夫的深浅与精神境界的高下。

朱子对文章审美特征的评价其实是基于以上的基础。他说“圣人辞不迫切”⑥,评曾巩文说:“曾文一字挨一字,谨严,然太迫。”⑦这正与程颐评张载文章风格相同。又说:“曾所以不及欧处,是纡徐曲折处。”⑧纡徐正所谓宽舒。“柳《伐原议》极局促,不好。”⑨《答巩仲至》:“刘侍读书气平文缓,乃自经术中来,比之苏公,诚有高古之趣。”⑩这些都可与程颐之说相印证。

程颐所论及的第二个层次问题是“浑厚”与“英气”。“英气”是精光毕露,而“浑厚”是“温润含蓄”,后者是圣人气象,前乃是贤者气象。两者的人格层次有高低之不同。圣人气象体现在文章上也是“含蕴”,程颐说“大率《六经》之言含蕴”⑪,正是此意。程颐又说:“大率言语须是含蓄有馀意”,⑫“凡立言欲含蓄意思”,⑬则是把含蓄当作了普遍的要求。《孟子》之“英气”便有“圭角”,就是有刚性棱角。朱子说孟子文章“明白峻洁”,就是此意。他在评曾子时说:

---

① 《朱子语类》,第 934 页。
② 《朱子语类》,卷十七,第 383 页。
③ 《二程集》,第 196—197 页。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道学家认为,人的精神世界虽是内心的事,但也必然表现于外,使接触到的人感觉到一种气氛。这种气氛,道学家称之为‘气象’。”“气象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现于外的,是别人所感觉的。”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5 册,第 121—122 页。
⑤ 《二程集》,第 190 页。
⑥ 《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 48 页。
⑦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6 页。
⑧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页 3314。
⑨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6 页。
⑩ 《晦庵文集》卷六十四,《朱子全书》第 23 册,第 3110 页。
⑪ 《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 148 页。
⑫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221—222 页。
⑬ 《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 20 页。

> 曾子便恁地刚,有孟子气象。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等语,见得曾子直是峻厉。①

朱子之推崇朴质浑厚,批评华丽,亦体现出此种精神。他称欧阳修文章“敷腴温润”,②“欧公不尽说,含蓄无尽”,③正有“温润含蓄”气象。这是欧阳修文章风格受到朱子推崇的原因。

六、修德与学文:道德工夫与文章工夫

按照程朱的论述,文章是内在道德的外在呈现,只要做修德的工夫成为有德者,则必然有言,必然有文章。在这种意义上说,文章是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修德工夫就是文章工夫,不必于文章本身下工夫。《程氏遗书》卷十八:

> 问:“出辞气,莫是于言语上用工夫否?”曰:“须是养乎中,自然言语顺理。今人熟底事,说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说得蹇涩。须是涵养久,便得自然。”④

“出辞气”出《论语·泰伯》,乃曾子之言:“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按照朱子的解释,辞是言语,气是声气。⑤ “出辞气”说的是言语声气等外在表达问题,引申到文章方面乃是指文章的语言表现形式问题。学生所问的是语言表达方面是否需要修养工夫。按照程颐的理论,辞气是外在的,乃是由内在发出。外在的辞气取决于内在的修养,故他说要“养乎中”,即明理,其内在之理明,发之于外,自然言语顺理。按照这种论述,不必于语言表达形式上用工夫,引申到文章上,就是不需要独立的文章工夫。

“养乎中”是工夫,于是就进入了理学的道德工夫论。程颐所说的修德工夫主要包括“主敬”与“致知”两方面。“主敬”是专一、庄肃,“致知”乃格物穷理,与《大学》的系统遂相关联。穷理的主要途径是读经,便为道德建立了知识基础。⑥在程颐,内在工夫的过程、深浅与表现于外之言辞文章的境界密切相关。他说“涵养久,便得自然”,“久”言工夫过程,“自然”为言辞表达之境界。自然即化工,在程颐的论述中,乃是圣人之文的境界。程颐说圣人“化工生物”般的文章不是可以学到的,但是,这种境界是可以通过修养工夫达到的。

朱子的道德工夫论继承了程颐之说,此学界论述已多,兹不赘。在道德工夫与文章境界关系方面,他也同样受程颐影响。他称“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⑦“学问以明理”乃朱子道德工夫论的中心,即是程颐所谓“养乎中”,按照“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的原理,就会“自然发为好文章”。

依照以上的理论逻辑,道德工夫就是文章工夫,不必有独立的文章工夫,这是建立在“有德者必有言”“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基础上的工夫论。但是,这乃是朱子文章论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程朱都深明词章之文有自己的传统与规范,要学作词章之文,就需要工夫。程颐说“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⑧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⑨就是此意。朱子说:“且莫说义理,只如人学做文章,……亦须是下工夫,始造其妙。”⑩也是

---

① 《朱子语类》卷三十五,第 923 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9 页。
③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10 页。
④ 《二程集》,第 208 页。
⑤ 《四书章句集注》,第 104 页。
⑥ 参见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6—90 页。余英时:《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人文与理性的中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8 年版,第 77—108 页。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第 312—316 页。
⑦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6—3307 页。
⑧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239 页。
⑨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239 页。
⑩ 《朱子语类》卷三十九,第 1018 页。

此意。按照前一论述逻辑,只要明理就“自然发为好文章”,不需要文章工夫;按照后一论述逻辑,必须有文章工夫,才能写出好文章(“造其妙”);换成现代的理论表述,前者意味着道德决定审美,后者意味着审美有自主性;那么,这两方面的论述似乎就存在着一个鸿沟,或者说对立,应该如何理解？事实上两者涉及文章的不同层次。当朱子就道德决定文章一面说,则其所言乃是就根本原理层面说的,所指涉者乃受道德决定的文章层面,如内容即道理,文章的结构,风格上的浑朴等;但是,就历史或现实中的具体的文章而言,文章有其体裁,各种体裁的文章在历史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与规范,这些就是理学家所谓词章之文。现实中人只要写文章,就不能回避文体层面的问题,就要在文体的传统中写作,理学家不可能把所有的词章之文的传统全部推翻,另起炉灶,创造各种新文体,他们在此一领域只能立足于词章之文的传统而对之进行改造,把词章之文纳入其文章系统。这就是何以朱子一方面批评韩愈、欧、苏的文章,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其文章价值的原因所在。理学家之文章论既然不能回避词章之文的传统,而一旦进入此一传统,就要面对文章家同样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从理学的角度说,程颐称:“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①朱子说:“事事物物各自有理。”②文章作为一物,也自有理。文章有不同的层次,也有各其理。要做好文章,必须穷文章之理,此即文章工夫。朱子深明文章工夫的重要,充分吸收了文章家的工夫论。但是在道德工夫与文章工夫之间,他认为有轻重缓急之分。他说:“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无者。故学者之,务有缓急先后,而不可以偏废。但不可使末胜本、缓先急耳。观圣人所谓‘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者,其语意正如此。”③在理学体系中,道德当然是大是本,文章是小是末,两者相较时,朱子自然强调其大本。然而一旦进入文章自身的领域,他便强调文章工夫的重要性,并且有具体的论述。

朱子所说的道德工夫主要是通过熟读经典,而文章工夫也是通过熟读典范的文章,在熟读典范这一点上,道德工夫与文章工夫具有一致性。朱子所说的这种文章工夫乃是细读与熟读。他说:“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④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细读、熟读之后,“意思语脉自是相似”呢？朱子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⑤按照这里的论述,熟读过程中,所读之书的意与言皆被内化,遂成为我之意与言,是为“有得”,“有得”便是充之于中,便是“有诸己”,按照内外关系的理论,发之于外,便会“意思语脉自是相似”了。

如果把细读与熟读横向展开,既包括明义理,也包括形式方面。义理一面即穷理,前已言之。其形式一面,他说:“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⑥在熟读细读过程中,读者晓文法的过程中也养成了文章审美上的鉴别力,即识。他说:“须是自看得这一人文字某处好,某处有病,识得破”,识力的养成也是靠“仔细看”,“但子细自看,自识得破”。⑦ 其方法不是博览,而是要通过精读文章来培养。只有识古人文章好处,才能作出好文章。他说:“韩退之、苏明允二公论作文处,他都是下这般工夫,实见得那好处,方做出这般文章。他都是将三代以前文字熟读后,故能如此。”⑧文章工夫与道德工夫都要熟读,但道德工夫的方向是熟

---

①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 188 页。
② 《朱子语类》卷十八,第 396 页。
③ 《晦庵文集》卷四十,《朱子全书》第 22 册,第 1844 页。
④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1 页。
⑤ 《朱子语类》卷十,第 168 页。
⑥ 《朱子语类》卷十,第 173 页。
⑦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0—3301 页。
⑧ 《朱子语类》卷一一六,第 2802 页。

读穷究义理,文章工夫的方向是熟读穷究其审美之理,同时模仿其形式(言语),做文章。他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①朱子之所以主张模仿,乃是基于他的关于文章具有“天生成腔子”的观念,有客观的法度,古人的文章体现或符合这种客观的法度。他说:“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间文章自会高人。”②后人学文章必须学习古人,其途径便是模仿。但是,模仿只是学习的一个阶梯,而非最高境地,通过模仿要达到更高的境地,便是“纯熟”,即一种合法则的自由境界。朱子划为文章典范的作家作品主要是西汉、唐宋古文家的作品。他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③

在朱子看来,韩愈与苏洵乃是文章工夫的典范。他说:“观韩文公与李翊书,老苏与欧阳公书,说他学做文章时,工夫甚么细密!”④朱子将韩愈《答李翊书》有关学文过程的论述放到文章工夫论的脉络论之,认为韩愈提出了文章工夫的问题。按照韩愈的说法,要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养”的过程,要把自己养成“仁义之人”,自然会发之于外在的文。韩愈自述其本人“养”的过程与方法,主要就是读书。⑤ 朱子由此观察到韩愈的文章工夫,并把这种工夫移用到读书明理的道德工夫论述中。朱子特别称赞韩愈《石鼎联句诗》“浸润著光精”一句,⑥韩愈原诗本描绘石鼎,但朱子显然将其放到读书明理的工夫论脉络中理解,“只是将圣人言语只管浸灌,少间自是生光精,气象自别。”⑦“浸润”是以水浸喻工夫过程中向内浸透深入的变化过程,他把“著精光”理解为经过内在修养过程而向外发露的光华,这乃是用“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来诠释此句。朱子所举苏洵与欧阳书,乃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朱子曾引用其文论读书法:

> 老苏自述其学为文处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此是他于学文上功夫有见处,可取以喻今日读书,其功夫亦合如此。⑧

朱子是将苏洵之自述学文方法与过程放到文章工夫论脉络中视之,而又将苏洵的文章工夫作为本人论述为学工夫的借鉴。此可以见出朱子的道德工夫论受到韩、苏影响的一面。

朱子以德言关系为主轴展开其文章论,文章为道德之必然呈现,修德为文章之根本工夫,如此则文章与理学之格物穷理的体系建立了必然联系,成为其理学系统的组成部分。朱子以理论文,实是将所有文章视为一说理的论述结构,认为义理的逻辑结构与文章的形式结构具有统一性,其美感特征为实而有条理。在朱子,文章之创作境界与表现形式乃是作者的修养工夫与精神境界的表现。朱子吸取了词章之学的传统,但对其作了理学的改造,使之成为理学文章论的组成部分。朱子文章论实启桐城派义理、词章之说,有物、有序之论,而桐城派崇尚欧、曾,其端绪亦在朱子文论中。

①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299 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1 页。
③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 3306 页。
④ 《朱子语类》卷三十九,第 1018 页。
⑤ 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第 36—43 页。
⑥ 此《石鼎联句诗》句,标弥明所作。朱子以为韩愈化名。《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二十一于此诗句下按云:“此诗句法全类韩公,而或者所谓寓公姓名者,盖轩辕反切近韩,弥字之义又与愈字相类,即张籍所讥‘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者也,故窃意或者之言近是。”《朱子全书》第 19 册,第 516 页。
⑦ 《朱子语类》卷一三七,第 3275 页。
⑧ 《朱子语类》卷十,第 178 页。

The Relation Between Principle and Literary Pattern: Zhu Xi's New Theory of Prose

Zhang 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fram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 Zhu Xi (朱熹) integrated prose into his Neo-Confucianist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writing,. Writing was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internal morality. Moral substance possessed by an author in the process of his cultivation became his principle in writing, with the logic of principle as the structure. Atmosphere was the outlook of an author's spiritual realm. The level of spiritual realm and that of prose were in agreement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Zhu Xi (朱熹), prose, principle (义理), literary pattern (词章)

(责任编辑　　郑　园)